



中国学术档案大系

主编 陈文新



经学档案

曾 军 编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中国学术档案大系

主编 陈文新

经学档案

曾 军 编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学档案/曾军编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1. 12

中国学术档案大系/陈文新主编

ISBN 978-7-307-09077-4

I. 经… II. 曾… III. 经学—研究—中国 IV. Z126. 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61082 号

责任编辑:李 琼 江俊伟

责任校对:王 建

版式设计:马 佳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湖北金海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41.5 字数: 615 千字 插页: 2

版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09077-4/Z · 115 定价: 85.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目 录

经学略说(节选)	章炳麟(1)
【评 介】	(5)
经今古文学(存目)	周予同(10)
【评 介】	(10)
传统的诠释与诠释学的传统	
——儒家经学思潮的演变轨迹与诠释学导向	姜广辉(15)
【评 介】	(30)
出土简帛与经学诠释的范式问题	郭齐勇(34)
【评 介】	(51)
明末清初经学研究的回归原典运动	林庆彰(56)
【评 介】	(73)
谈谈《周易》辩证法问题(存目)	金景芳(78)
【评 介】	(78)
易学哲学与中国哲学的民族特点(存目)	朱伯崑(83)
【评 介】	(83)
《彖传》的道家思维方式	陈鼓应(87)
【评 介】	(101)
“卦气”溯源	刘大钧(104)
【评 介】	(117)
论易学对科学的影响	董光壁(121)
【评 介】	(131)
论帛书《系辞》的学派性质	廖名春(135)
【评 介】	(161)
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存目)	顾颉刚(165)

【评 介】	(165)
古文尚书作者考(存目)	陈梦家(173)
【评 介】	(173)
洪范成书时代考(存目)	刘起钊(178)
【评 介】	(178)
说 鱼	闻一多(183)
【评 介】	(202)
诗经学四大公案的现代进展	夏传才(208)
【评 介】	(228)
从经学到文学	
——论明代“《诗经》学”的历史贡献	刘毓庆(233)
【评 介】	(245)
驷马车中的诗思	扬之水(248)
【评 介】	(261)
略论“礼是郑学”	杨天宇(265)
【评 介】	(274)
《周礼》内容的分析及其制作时代(存目)	杨向奎(278)
【评 介】	(278)
对《士丧礼、既夕礼中所记载的丧葬制度》几点意见(存目)	
.....	沈文倬(283)
【评 介】	(283)
论清人《仪礼》校勘之特色	彭 林(288)
【评 介】	(308)
《左传》成书年代论述(存目)	杨伯峻(312)
【评 介】	(312)
春秋公羊学说体系的形成及其特征	陈其泰(317)
【评 介】	(330)
百年来经学论著提要	
(一) 通论类	(334)
(二) 周易类	(363)

>>> 目 录 <<<

(三) 尚书类	(493)
(四) 诗经类	(508)
(五) 三礼类	(575)
(六) 春秋三传类	(595)
百年来经学大事记	(627)
后 记	(656)

经学略说（节选）

章炳麟

经之训常，乃后起之义：《韩非·内外储》首冠经名，其意殆如后之目录，并无常义。今人书册用纸，贯之以线。古代无纸，以青丝绳贯竹简为之。用绳贯穿，故谓经。经者，今所谓线装书矣。《仪礼·聘礼》：“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礼记·中庸》云：“文武之政，布在方策。”盖字少者书于方，字多者编简而书之。方不贯以绳，而简则贯以绳。以其用绳故曰编，以其用竹故曰篇。方，版牍也。古者师徒讲习，亦用方誊写。《尔雅》：“大版谓之业。”故曰肄业、受业矣。《管子》云：“修业不息版。”修业云者，修习其版上之所书也。竹简繁重，非别版书写，不易肄习。二尺四寸之简（《后汉书·周磐传》：编二尺四寸简写《尧典》），据刘向校古文《尚书》，每简或二十五字，或二十二字，知一字约占简一寸。二十五自乘为六百二十五。令简策纵横皆二十四寸，仅得六百二十五字。《尚书》每篇字数无几，多者不及千余。《周礼》六篇，每篇少则二三千，多至五千。《仪礼·乡射》有六千字，《大射仪》有六千八百字。如横布《大射》《乡射》之简于地，占地须二丈四尺，合之今尺，一丈六尺，倘师徒十余人对面讲诵，便非一室所能容。由是可知讲授时决不用原书，必也移书于版，然后便捷。故称肄业、受业，而不曰肄策、受策也。帛，绢也，古时少用。《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每书皆云篇；数术、方技，则皆称卷。数术、方技，乃秦汉时书，古代所无。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汉人亦有作。所以不称卷者，以刘向叙录，皆用竹简杀青缮写，数术、方技，或不用竹简也。惟图不称篇而称卷，盖帛书矣（《孙子兵法》皆附图）。由今观之，篇繁重而卷简便，然古代质厚，用简者

多。《庄子》云：“惠施多方，其书五车。”五车之书，如为帛书，乃可称多；如非帛书，而为竹简，则亦未可云多。秦皇衡石程书，一日须尽一石。如为简书^①，则一石之数太多，非一人一日之力所能尽（古一石当今三十斤，如为帛书，准之于今，当亦有一二百本）。古称奏牍，牍即方版，故一日一石不为多耳。

周代《诗》《书》《礼》《乐》皆官书。《春秋》史官所掌，《易》藏太卜，亦官书。官书用二尺四寸之简书之。郑康成谓六经二尺四寸，《孝经》半之，《论语》又半之是也。《汉书》称律曰“三尺法”，又曰“二尺四寸之律”。律亦经类，故亦用二尺四寸之简。惟六经为周之官书，汉律乃汉之官书耳。寻常之书，非经又非律者，《论衡》谓之短书。此所谓短，非理之短，乃策之短也。西汉用竹简者尚多，东汉以后即不用。《后汉书》称董卓移都之乱，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滕囊，可知东汉官书已非竹简本矣。帛书可卷可舒，较之竹简，自然轻易，然犹不及今之用纸。纸之起源，人皆谓始于蔡伦，然《汉书·外戚传》已称赫蹄，则西汉时已有纸，但不通用耳。正惟古人之不用纸，作书不易；北地少竹，得之甚难；代以缣帛，价值又贵，故非熟读强记不为功也。竹简书之以漆，刘向校书可证；方版亦然。至于缣帛，则不可漆书，必当用墨。《庄子》云：宋元君将画图，众史舐笔和墨。则此所谓图，当是缣素。又《仪礼》铭旌用帛。《论语》子张书绅。绅以帛为之，皆非用帛不能书。惟经典皆用漆书简，学生讲习，则用版以求方便耳。以上论经之形式及质料。

《庄子·天下篇》：“《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列举六经，而不称之曰“经”。然则六经之名，孰定之耶？曰：孔子耳。孔子之前，《诗》《书》《礼》《乐》已备。学校教授，即此四种。孔子教人，亦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又曰：“《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可见《诗》《书》《礼》《乐》，乃周代通行之课本。至于《春秋》，国史秘密，非可分布，《易》

① 吴永坤校记：“‘简书’疑‘帛书’之误。”

为卜筮之书，事异恒常，非当务之急，故均不以教人。自孔子赞《周易》、修《春秋》，然后《易》与《春秋》同列六经。以是知六经之名，定于孔子也。

五礼著吉、凶、宾、军、嘉之称，今《仪礼》十七篇，只有吉、凶、宾、嘉，而不及军礼。不但十七篇无军礼，即《汉书》所谓五十六篇《古经》者亦无之。《艺文志》以《司马法》二百余篇入《礼》类（今残本不多），此军礼之遗，而不在六经之内。孔子曰：“军旅之事，未之学也。”盖孔子不喜言兵，故无取焉。又古律亦官书，汉以来有《汉律》。汉以前据《周礼》所称，五刑有二千五百条，《吕刑》则云三千条。当时必著简册，然孔子不编入六经，至今无只字之遗。盖律者，在官之人所当共知，不必以之教士。若谓古人尚德不尚刑，语涉迂阔，无有是处。且《周礼·地官》之属，州长、党正，有读法之举，是百姓均须知律。孔子不以入六经者，当以刑律代有改变，不可为典要故尔。

六经今存五经，《乐经》汉时已亡。其实，六经须作六类经书解，非六部之经书也。礼，今存《周礼》、《仪礼》。或谓《周礼》与《礼》不同，名曰《周官》，疑非礼类。然《孝经》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左传》亦云“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由《孝经》《左传》之言观之，则《周官》之设官分职、体国经野，正是礼类。安得谓与礼不同哉？春秋时人引《逸周书》皆称《周书》，《艺文志》称《逸周书》乃孔子所删百篇之余。因为孔子所删，故不入六经。又《连山》《归藏》，汉时尚存（桓谭《新论》云：或藏兰台），与《周易》本为同类。以孔子不赞，故亦不入六经。实则《逸周书》与《书》为一类，三易同为一类，均宜称之为经也。

今所传之十三经，其中《礼记》《左传》《公羊》《穀梁》均传记也。《论语》《孝经》，《艺文志》以《诗》《书》《易》《礼》《春秋》同入六艺，实亦传记耳。《孟子》应入子部，《尔雅》乃当时释经之书，亦不与经同。严格论之，六经无十三部也。

史部本与六经同类。《艺文志》春秋家列《战国策》、《太史公书》。太史公亦自言继续《春秋》。后人以史部太多，故别为一类。

荀勖《中经簿》始立经、史、子、集四部，区经、史为二，后世仍之。然乙部有《皇览》。《皇览》者，当时之类书也，与史部不类。王俭仿《七略》作《七志》（《七略》本仅六种：一、六艺；二、诸子；三、诗赋；四、兵书；五、数术；六、方技），增图谱一门，称六艺略曰经典志，中分六艺、小学、史记、杂传四门。有心复古，颇见卓识。又有《汉志》不收而今亦归入经部者，纬书是也。纬书对经书而称，后人虽不信，犹不得不以入经部。独王俭以数术略改为阴阳志，而收入纬书，以纬书与阴阳家、形法家同列，不入经典，亦王氏之卓识也。自《隋书·经籍志》后，人皆依荀勖四部之目，以史多于经，为便宜计，不得不尔。明知纬书非经之比，无可奈何，亦录入经部，此皆权宜之计也。

兵书在《汉志》本与诸子分列。《孙子兵法》入兵书，不入诸子。《七志》亦分兵书曰军书，而阮孝绪《七录》（依王俭为七部，不分经、史、子、集）以子书、兵书合曰子兵，未免谬误。盖当代之兵书，应秘而不宣，古代之兵书，可人人省览。《孙子》十三篇，空论行军之理，与当时号令编制之法绝异，不似今参谋部之书，禁人窥览者也。是故当代之兵书，不得与子部并录。

向、歆校书之时，史部书少，故可归入《春秋》。其后史部渐多，非别立一类不可，亦犹《汉志》别立诗赋一类，不归入《诗经》类耳。后人侈言复古，如章实斋《校讎通义》，独断断于此，亦徒为高论而已。顾源流不得明，纬与经本应分类，史与经本不应分，此乃治经之枢纽，不可不知者也。

汉人治经，有古文、今文二派。伏生时纬书未出，尚无怪诞之言。至东汉时，则今文家多附会纬书者矣。古文家言历史而不信纬书，史部入经，乃古文家之主张；纬书入经，则今文家之主张也。

古文家间引纬书，则非纯古文学，郑康成一流是也。王肃以贾、马之学，反对康成。贾虽不信纬书，然亦有附会处（《后汉书》可证），马则绝不附会矣（马书今存者少）。

至三国时人治经，则与汉人途径相反。东汉今文说盛行之时，说经多采纬书，谓孔子为玄圣之子，称其述作曰为汉制法。今观孔林中所存汉碑，《史晨》《乙瑛》《韩敕》，皆录当时奏议文告，并用纬书

之说。及黄初元年，封孔羨为宗圣侯，立碑庙堂，陈思王撰文，录文帝诏书，其中无一语引纬书者。非惟不引纬书，即今文家，亦所不采。以此知东汉与魏，治经之法，截然不同。今人皆谓汉代经学最盛，三国已衰，然魏文廓清讖纬之功，岂可少哉！文帝虽好为文，似词章家一流，所作《典论》，《隋志》归入儒家。纬书非儒家言，乃阴阳家言，故文帝诏书未引一语。岂可仅以词章家目之！

自汉武立五经博士，至东汉有十四博士（五经本仅五博士，后分派众多，故有十四博士）。《易》则施、孟、梁丘、京，《书》则欧阳、大小夏侯，《诗》则齐、鲁、韩，《礼》则大小戴，《春秋》则严、颜（皆《公羊》家），皆今文家也。孔安国之古文《尚书》，后世不传。汉末，马、郑之书，不立学官。《毛诗》亦未立学官。古文《礼》传之者少。《春秋》则《左氏》亦未立学官。至三国时，古文《尚书》《毛诗》《左氏春秋》，皆立学官，此魏文帝之卓见也。汉熹平石经，隶书一字，是乃今文。魏正始时立三体石经，则用古文。当时古文《礼》不传，《尚书》《春秋》皆用古文。《易》用费氏，以费《易》为古文也（传费《易》者，汉末最盛，皆未入学官。马、郑、荀爽、刘表、王弼皆费氏《易》）。《周礼》则本为古文。三国之学官，与汉末不同如此。故曰魏文廓清之功不可少也。

清人治经，以汉学为名。其实汉学有古文、今文之别。信今文则非，守古文即是。三国时渐知尊信古文。故魏、晋两代，说经之作，虽精到不及汉儒，论其大体，实后胜于前。故汉学二字，不足为治经之正轨。昔高邮王氏，称其父熟于汉学之门径，而不囿于汉学之藩篱。此但就训诂言耳。其实，论事迹、论义理，均当如是。魏、晋人说经之作，岂可废哉！以上论经典源流及古今文大概。

（原载于章太炎《国学讲演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4～51页）

【评 介】

现代经学无疑当从章炳麟开始说起。章炳麟是晚清古文经学的最后一位大师，也是促使传统经学向现代经学转化的第一位大师。胡适

称其为“清学殿军”、古文最后“压阵大将”。朱维铮认为：“倘称经学，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它曾经支配中国中世纪的思想文化领域；二、它以当时政府所承认并颁行标准解释的‘五经’或其他经典，作为理论依据；三、它具有国定宗教的特征，即在实践领域中，只许信仰，不许怀疑。”^① 这种界定，比较注重经学成为官学被意识形态化的一面。事实上，经学固然受外部的政治与社会环境的影响，其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内在理路，这两者往往同时起作用，并通过某些著名经学人物表现出来。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章炳麟正是这样一位具有代表性的经学人物。

章炳麟（1869—1936），初名学乘，字枚叔，后更名绛，号太炎，后又改名炳麟。浙江余杭人。他出身于一个世代书香门第而后又遭败落的家庭，一生经历了戊戌维新改良运动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两个历史时期，走过曲折的道路，是我国近代杰出的革命家和著名学者。鲁迅十分推崇他那“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的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和“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的豪杰精神，并誉之为“后生的楷范”。（参见《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第六卷）辛亥革命后，他退居书斋，钻研学问，成为一代国学大师，在经学、哲学、文学、语言学、文字学、音韵学、逻辑学等方面都有所建树。1936年6月14日在苏州病逝。时人评其为革命元勋、国学泰斗。国民政府以国葬葬其于杭州西湖畔张苍水墓侧。其主要著作由后人编入《章氏丛书》《章氏丛书续编》和《章氏丛书三编》，自1982年起上海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章太炎全集》。

章炳麟一生处于国家多难之秋，他坚持倡导国学，目的是激发民族主义精神和同胞的爱国热忱。1903年，他把民族文化概括为“国粹”，包括语言文字、典章制度和人物事迹三部分。1906年，章炳麟出狱，东渡日本，加入同盟会，主办《民报》。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他发表演说，认为当前最紧要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从

^① 朱维铮：《中国经学史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10页。

此开始了在此旗帜下的保存国故、宣传民族文化的不懈努力。10月，章炳麟成立国学讲习会，作《论诸子学》等讲演。1922年4月至6月，他应江苏教育会之邀，主讲国学，每周一次，共十次，讲题为《国学大概》《治国学方法》《经学之派别》《哲学之派别》《文学之派别》《国学之进步》。1936年冬、1937年春间，于章氏国学讲习会授《小学略说》《经学略说》《史学略说》《诸子学略说》，都有讲演记录刊行。1937年夏，给国学讲习会讲完《尚书》。正如黄季刚在《太炎先生行述记》中所说：“其授人国学也，以谓国不幸衰亡，学术不绝，民犹有所观感，庶几收硕果之效，有复阳之望。故勤勤恳恳，不憚其劳。”

经学在章炳麟的国学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他治经学是为了给民族主义的政治观念提供知识基础。章炳麟自幼接受了较为系统的经学教育。他的父亲章浚，曾任县学训导，并在诂经精舍担任监院多年，喜好经术。章炳麟6岁入私塾就读。9岁从外祖父朱有虔处接受系统的文字音韵学教育。13岁在父章浚、表兄章钱指导下研读许慎《说文解字》、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顾炎武《音学五书》、郝懿行《尔雅义疏》、王引之《经义述闻》等，打下汉学基础。18岁开始“壹意治经”，23岁遵父遗训，进诂经精舍学习。当时诂经精舍由经学大师俞樾主持，授学者有高学治、谭献等。“始治经，独求通训诂知典礼而已；及从俞先生游，转益精审，然终未窥大体。二十四岁，始分别古今文师说。”（《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在这里，章炳麟接受了较为正统的朴学训练。

章氏早年致力于《左传》的研究，以回应康有为攻击《左传》的公羊学。主要著作是《春秋左传读》（初名《春秋左传杂记》）五卷及《驳箴膏肓评》《砭后证》，考证《左传》传授之有据，驳难清代常州今文学家刘逢禄《左传》不传《春秋》之说，以推翻今文家所谓《左传》为刘歆伪造的说法。1930年又撰《春秋左氏疑义答问》。可见，晚年他依然坚持他的古文学立场。他又在《订孔》篇中提出孔子“良史”说，强调孔子保存文化之功绩。他指出治经为治史之基础，“由小学入经学，经学实；由经学入史学，史学真”，坚持经学的史学化道路，然已不同于晚清以前的经古文学。

章炳麟的经学又具有西学背景。他的经史研究注重运用近代西学理论方法。其经学论著，从早年的《膏兰室札记》到晚年的《春秋左氏疑义答问》《古文尚书拾遗》，都不乏西学方法的应用。如他运用近代西方社会史学理论阐释《周易·序卦传》的《自述学术次第》《易论》《历史之重要》等文章，以及把东西方逻辑学方法与史学方法融为一体的《订孔》《征信论》《信史》等文章，都是这样的典范之作。

《国学讲演录》是章炳麟晚年的讲演记录，其中《经学略说》代表了他一生治经学的基本观点。《经学略说》一论经之形式及质料，二论经典源流及古今文大概，三论经典之来源，四分讲各经之源流。本文节选了其中第一、二两个部分。

章炳麟从字训开始，指出“经”原指以绳穿简，类似于今之线装书，训为“常”是后起之义。他分析了方版、简策、缣帛等古书载体，说明古书称编、称卷之由来，以古代书籍制作的质料与形制、装帧情况佐证“常”为后起之义。

“经”既然无恒常之义，那么这种至高无上的价值意义显然是由后世之人添加上去的。章炳麟仔细辨析经典的源流，即几部典籍入经的过程，是想还其史料的本来面目，证明这些典籍原本是各种典章制度的记载。他认为，六经原本存在，其名定于孔子，孔子是六经的整理者。在整理过程中，因为孔子不喜言兵而刑律代有变革的缘故，没有将军礼、刑律等方面的史料纳入进去。六经实际为六类经书，《逸周书》《连山》《归藏》及《周官》都应该归属各自的行列；十三经中又有经、传、记的分别，六经并无十三部。因此，六经、十三经的说法都属后起。他进一步认为，纬与经本应分类，史与经本不应分，经史同源乃治经之枢纽。在此基础之上，他区别今古文，认为史部入经，是古文家之主张；纬书入经，是今文家之主张。古文家言历史而不信纬书，今文家言微言大义而史料证据不足。显然，章炳麟辨析十三经的来源，主张经史不分与史部入经，反对谶纬之书，正是古文经学“六经皆史”的余绪，这是经古文学的重要治学理念。

章炳麟为经正名，消解了汉唐以来以五经为恒常之道的价值体系，反映了晚清以降传统经学从中心走向边缘的文化命运。他从文字

学和历史学出发,将经拉下神坛,揭示经的原始意义及经典的传承源流,还其本来面目。在这个意义上,《经学略说》既是对康有为今文经学“三世说”的回应,也是经学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标志。

章炳麟的经学,是与小学、文学、史学、诸子学等并列的学问,是史学化了的经学。然其破除经学权威,并非是要将经学摧毁,而是主张积极汲取经学中有益于现实的精神营养。他认为:种姓不灭,其根在于国学不灭。他将小学、文学、经学、诸子学、史学视为国学的几个分支,分别梳理各自的学理体系,是为了保存国粹,激发人们对国学和国家的热爱之情。在《史部略说》中他指出对史书不应无故怀疑,“矜奇炫异,抹杀事实,则好学之士不当尔也”,显现了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学术品格。而在这种坚持下,经学走向史学也成为必然。

历史学家侯外庐说:“章炳麟对于中国学术文化遗产的论述十分丰富。他是经古文学派最后一位大师,同时又是儒家传统的拆散者。他的思想的发展变化及其矛盾的性格,反映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信然。

章炳麟经学论著目录:

《章太炎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第一册《膏兰室札记》、《诂经札记》、《七略别录佚文征》,1982年2月出版。

第二册《春秋左传读》和《叙录》、《驳箴膏肓评》,1982年7月出版。

第三册《馗书》初刻本、重订本,《检论》,1984年7月出版。

第四册《太炎文录初编》,1985年9月出版。

第五册《太炎文录续编》,1986年3月出版。

第六册《齐物论释》《齐物论释定本》《庄子解故》《管子余义》《论语骈枝》《体撰录》《春秋左氏疑义答问》,1986年12月出版。

第七册《新方言》《小学答问》《岭外三州语》《说文部首均语》《文始》《新出三体石经考》,1995年5月出版。

第八册《医论集》,1994年12月出版。

经今古文学（存目）

周予同

（原载于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9页）

【评 介】

传统经学向现代经学的转化在晚清至民国经今古文学的论争中逐步明朗化。晚清龚自珍、康有为、皮锡瑞主今文经学，作《新学伪经考》《经学历史》，借春秋公羊学的托古改制等经义讥切时政。章炳麟主古文经学，撰《国故论衡》《国学讲演录》及《左传》研究与之颉颃。后起的周予同撰《经今古文学》对此论争进行了总结和评价，影响很大。

周予同（1898—1981），原名毓懋，学名遽，字予同、豫桐，笔名天行。浙江温州瑞安人。从瑞安中学毕业后，于1916年以第一名考取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五四运动前夕，和同学组织励学会、工学会、平民教育社，进行“工读主义”实验。五四运动起，以高师学生代表身份，参加火烧赵家楼的斗争。次年与在京温籍学生创办《瓯海新潮》半月刊，传播新思想。是年夏，又以第一名优异成绩毕业。1921年，任上海商务印书馆国文部编辑，后任《教育》杂志社主编，并在上海大学任教。1925年春发表《经今古文之争及其异同》，次年改名为《经今古文学》出版。1926年发表论文《僵尸的出祟》，反对北洋政府强令学校读经。1928年12月，任中国著作者协会执行委员。1929年出版《〈经学历史〉注释》。1932年一度回乡任教于浙江省立十中。1933年，任安徽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出版《群经概论》。1934年印行《汉学者

承记选注》。1935年，回上海任暨南大学教授兼史地系主任，后兼南洋研究馆主任及暨南大学教务长；曾与蔡元培、吴敬恒、陈望道等署名发表《推行手头字缘起》，与柳亚子、刘大杰等署名发表《我们对于文化运动的意见》。1936年8月，任吴越史地研究会理事；12月，与马相伯、李公朴、陶行知、邹韬奋等署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1943年任开明书店编辑兼襄理。1945年，辞去开明书店职务，出任复旦大学教授，曾与张志让、蔡尚思、沈体兰等发起组织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周予同任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副教务长。1959年起，担任中国经学史课，指导研究生撰写论文，并兼任《辞海》副主编、编辑委员兼分科主编，负责主编经学史部分。1961年，任大学教材《中国历史文选》主编，编成上、下两册。“文化大革命”起，因在座谈会上公开指责姚文元“断章取义，乱箭射人”，并力言“吴晗是好人”，遭受批斗，所著书籍文章被指为“毒草”。1969年，因急性心脏病发作，瘫痪卧床、双目失明达13年。1981年7月15日在上海病逝，享年83岁。

《经今古文学》是周予同关于中国经学史的第一部专著。初稿题为《经今古文之争及其异同》，发表于1925年2、3月出版的《民铎》杂志第六卷第二、三号。1926年由商务印书馆列入“国学小丛书”之一出版，改为《经今古文学》。1929年10月由商务印书馆再版，另编入“万有文库”之中。1955年经过著者修订，由中华书局重版。1983年收入《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列为首篇。

《经今古文学》的写作主要针对的是当时为复辟造声势的孔教救国论，以及1915年徐世昌及程树德等编制教育纲要添设读经、1925年章士钊要在学校添设读经等现象。周予同后来又在《僵尸的出祟》一文中，对学校读经问题，从经的定义、经的领域、经和孔子的关系三方面再次作出了回应。

周予同在《经今古文学》1955年8月的《重印后记》里指出，五四运动以后的文史界，大约可分为四派：一派是超“经学”、否定“经学”而转究史学，虽然如何否定、如何转变还没有正确的方向，但在当时已算是“前进的”。一派是根本不知道“汉宋学”的异同，